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郑杭生

The Beginning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刘少杰/著

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The Beginning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刘少杰/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刘少杰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社会学文库)

ISBN 978-7-300-07675-1

I. 中…

II. 刘…

III. 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3642 号

社会学文库

主编 郑杭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刘少杰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0.2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0 000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社会学文库

编委会

主 编 郑杭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广海	王思斌	王雅林	包智明	田毅鹏
孙立平	刘少杰	刘世定	刘祖云	关信平
庄孔韶	江立华	李培林	李 强	李路路
苏国勋	沈关宝	宋林飞	吴忠民	张 静
周晓虹	洪大用	侯钧生	郭于华	郭志刚
黄 平	景天魁	景 军	蔡 禾	潘绥铭
戴建中				

总 序

现在，文库不少，社会学文库也有几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持一套社会学文库，就不得不追问自己：这套文库只是单纯在数量上增加一个文库而已，还是应该在质量上力求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本套文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定位问题。经过考虑，本套文库的定位至少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套研究性的文库。就是说进入本套文库的著作，必须是研究性、探索性的。研究性、探索性的必备要素是与某种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即有某种创新性，因此，它们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介绍性的、编译性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因为类别不同，后者应该有自己的出版渠道。

社会学研究无疑涉及诸多方面，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对现实社会现象的研究，又有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等等。本文库欢迎一切真正有研究的著作；同时，根据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要求，根据本国的国情，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 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研究著作。
-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的研究著作。

第二，它是一套精品性的文库。就是说，在研究性的著作中，我们更看重精品之作。所谓精品，在内容上至少要符合下述几条中的一条或同时具有：一是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公认有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二是能够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贡献。三是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有所推动。四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所促进。而在形式上，要有与内容相匹配的叙述形式，要有较好的可读性，力求深入浅出，尽可能雅俗共赏，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第三，它是一套使社会学界新生力量脱颖而出的文库。就是说，通过研究性的精品之作，使那些在社会学界没有什么知名度，或知名度不高的“无名小卒”、新生力量、后起之秀程度不同地提高知名度，把他们实实在在地介绍给学界和社会，使他们尽快成为学界名人，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也许能够成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有效渠道之一。众所周知，没有或缺少新生力量的学科和学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忽视现在的学界名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负有提携后进的重任。我们真诚希望现有的学界名人和即将脱颖而出的学界名人，共同使本文库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文库，在学界和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它是一套供不同学派观点争鸣的文库。一个没有不同学派争鸣的学界，不能说是成熟的。我在社会学界多次强调“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如果本文库在促成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学派形成方面、在促成不同学派展开富有成果的争鸣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将会感到非

常高兴和欣慰。本文库将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一视同仁。

总之，我们真诚希望本文库能够出研究成果、出精品、出名人、出学派。简言之，我们把“四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的定位。

古人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定位于“上”，可能得乎“中”，定位于“中”，可能得乎“下”。本文库这种“四出”的定位，从目标上说应该属于“上”，但结果仍有两种可能：或“上”或“中”。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最后究竟如何，当由读者和时间来鉴定。

应当指出，本文库是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候出版的。

首先，无论是就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来说，还是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而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大有可为的发展时期。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确认。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感受到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并领悟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的基础环节。人们对社会学从不了解、不甚了解甚至误解到逐步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用语（如社区、社会化、弱势群体、社会转型、良性运行等）日益普及化、大众化，其中一些还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和使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了自上而下的体制条件，而且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氛围。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该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将于2004年7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现在欧美社会学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无疑，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无论从规模、投入，还是从成果、影响等方面说，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界如此关

注中国社会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本文库，应当说是正当其时。我们希望不要辜负这样好的条件。

其次，这种不平常性还表现在世界社会学正处在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过程之中。这种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我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

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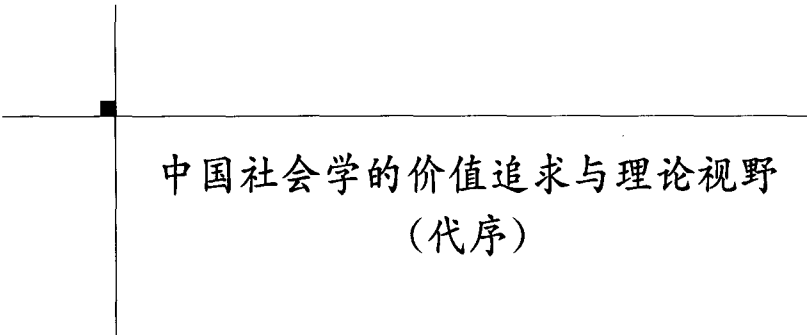
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世界社会学重建的步伐，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也真诚希望，本套文库能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以上权且作为本文库的序言，与大家共勉。

郑杭生

2003年8月于气和文轩



中国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视野

(代序)

自严复和康有为等人论及群学以来，中国社会学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初创形成与历史演化，会发现中国社会学虽然同西方社会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因为中国社会学在思想渊源、现实基础和面对问题等方面的特殊性，所以在价值追求、学术胸怀和理论视野等方面都同西方社会学有很大区别。明晰这些区别的根据和必然性，不仅可以把握中国社会学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而且也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当代建构汲取有益的启示。

一、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

无论西方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都是直面社会危机而诞生的。西方社会学诞生时面对的社会危机主要是阶级斗争引发的社会秩序紊乱，所以孔德为实证社会学提出的根本任务是重建社会秩序；中国社会学诞生时面对的社会危机主要是列强入侵而导致中华民族危亡，因此严复、康有为等人为中国社会学提出的根本任务是

呼唤国民团结自强，实现民族复兴。

毫无疑问，重建社会秩序和实现民族复兴都是明确的价值追求。就此而言，西方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价值中立，中国社会学也更是表现出强烈的价值追求。在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后来的发展历史中，也找不到哪一个学术流派或哪一位社会学家是以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待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或社会问题的，所以韦伯主张的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中立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学术幻境。

价值追求本来是主体原则的伸张，然而在孔德那里却认为是对客体规律的服从。因为孔德认为，社会秩序是像星体运行规律一样的铁的必然性^①，所以追求社会秩序的重建，其实质乃是认识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尽管孔德也承认社会秩序中有人为秩序的成分^②，但是他最终还是以物理学家的科学眼光确定实证社会学的任务。严复引入的西方社会学是比孔德追求的具有更加严格的客观性或科学性的斯宾塞生物社会学，受斯宾塞的影响，严复也用客观规律解释中国应当变革图强的价值理想。^③

然而，不仅民族危亡的灾难让中国社会学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在民族危亡面前无动于衷的国民意识又让中国社会学家感到最严峻的事实是国民迟钝甚至麻木的主观性。所以包括严复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很快从注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中产生了注重主观教化的人文精神。与注重教化的人文精神相关，社会学一开始被严复翻译为群学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社会学被译为群学，不仅因为荀子论及群学，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中国社会学家期望国人团结自强的主张。因此，严复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传播和研究群学的方式与斯宾塞不同，其主要注意力不在于对群体结构的分析，而在于

① 参见[法]孔德：《论实证精神》，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② 参见上书，41页。

③ 参见严复：《严复致夏曾佑》，载《中国哲学》，第6辑，34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1。

呼唤国人合成群体，发挥群力，团结抗敌，复兴中华。

团结合群，是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强烈的时代呼唤，是中国社会学刚刚崭露头角便表现出的强烈的人文精神。中国社会学的人文精神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精神不是像在近现代西方学术中那样的对立关系，而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为中介实现的一种融合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学以经世致用的中国学术传统融合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人文精神。

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起于明末清初，中经乾嘉考据学派到了晚清今文经学发扬光大。龚自珍、廖平和康有为等人，承继了乾嘉考据学返回古典、注重客观实证的学术追求，将之与庄存与、刘逢禄的今文经学传统结合，形成了晚清今文经学。而晚清今文经学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直接源泉之一，尽管其尚未达到现代学术学科化的程度，亦即它还没有明确地分化为文史哲、政法等学科，但是其中已经明确地包含了现代学科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就社会学而言，在晚清今文经学中能够发现很多与社会学明确相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如龚自珍等人提倡的客观求实、归纳推理、注重实用等方法原则，同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原则都是一致的。

不过，晚清今文经学中的经世致用原则，又与单纯崇拜科学精神的实证原则不同，它同时也包含了对人文精神的肯定。从龚自珍和魏源开启今文经学，到康有为集今文经学之大成，今文经学中表现出的实证精神都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精神或民族精神。王国维曾批评龚自珍和魏源不唯学术而学术，以致用政治要求冲淡学术追求。^①梁启超对晚清学术政治化倾向持肯定态度，他明确指出，康有为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倡求真务实，更重要的在于使今文经学政治化，亦即把今文经学的学术研究同民族危亡与复兴直接统一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现实矛盾对中国学术的要

① 参见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载《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之《观堂集林》，卷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求，是中国学术不可推卸的使命，而且也是中国学术超越空疏、走向进步的标志。^①

晚清今文经学中的民族精神和政治精神，就是一种具体的、真实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起于文艺复兴运动，当时人文主义者面临的使命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个体的生存价值对抗上帝的抽象本体。所以人文主义者呼唤的人性是人的个体性；晚清今文经学重视人的生存价值并不逊于人文主义者，但是他们面对的中国人的问题不是普遍本体对个性的压抑，而是外族大举入侵导致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简言之，19世纪后期中国人的问题首先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包容所有国人于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问题。所以，关心中国人、拯救中国人，就必须首先关心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就是在19世纪后期中国大地上的真实而具体的人文精神。

人性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文艺复兴运动呼唤的人性是个性，而中国晚清今文经学乃至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呼唤的人性是群性、民族性亦即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晚清今文经学和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人文精神同文艺复兴中兴起的人文精神具有互补性。实际上，仅仅强调个性同仅仅强调社会性都是片面的，这个道理在中国社会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后便得到了认识，梁启超从呼唤合群到后来提出改造国民性、化育新民的主张，便十分明显地说明他对人的社会性和个性有了统一的认识。

晚清今文经学自龚自珍、魏源起就是一种开放的学术传统，所以西方学术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科学精神不能不对晚清今文经学产生强烈影响。龚自珍重视归纳求证；康有为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效仿几何学撰写《实理公法全书》^②。但是无论他们怎样重视和学习西方科学，民族危亡都不能不成为他们必须首先正视的严峻事实。只有首先救国保种，然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对中华民族有实

① 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02～1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参见康有为：《康有为大同论二种》，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际意义，因此，在晚清今文经学中，救国保种、复兴中华是第一要义，注重实证、学习科学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一要义的途径和手段。

康有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把关于社会制度、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思考，都融入其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之中，对社会生活开展的丰富研究，目的都在于支持其社会改良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因此，晚清今文经学为中国社会学输入的，是植根于中国社会重大变迁的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强烈的价值要求，而这种政治目的和价值要求，正是中国社会学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能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关注的新学术的根本原因。清末民初，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李大钊、瞿秋白、李达、周谷城、梁漱溟等一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社会学研究中，与他们对社会学研究给予的价值期望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社会学研究不具有与当时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政治目标和价值理想，怎能在民族危难之际吸引一大批热血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呢？

二、汇集百川的学术胸怀

中国社会学具有汇集百川的学术胸怀，而这种广阔的胸怀在其开创之初就通过严复和康有为得到了展开。关于谁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严复最先引入西方社会学，所以严复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还有人认为康有为曾于1891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授群学，因此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应是康有为。可见，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事实上，严复和康有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但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康有为主要是凭依中国学术传统开展社会学研究的，而严复则主要是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推进社会学思想理论的传播。前者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而后者则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

内源外引的学术开端，说明中国社会学的创立不仅仅是对西方社会学的简单引入，而且还表明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就承继了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学术精华。中国社会学这种双重性开端，一方面要求人们研究中国社会学形成与演化的历史时，既要考虑到西方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同时又要在当代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演化变迁中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承认中国社会学这种双重性开端十分重要。这首先说明中国社会学不仅仅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有中国学术的本土根源，不应像现在大部分论及中国社会学的著述那样，片面地在译介或引入西方社会学方面考察中国社会学的起点，而应同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变迁演化中探索中国社会学形成与发展的本土根据；其次，中国社会学的双重性开端还说明，不应仅仅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构架来评价和解释中国社会学，而应当同时注意发现中国学者用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渊源于学术传统的非西方概念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提问与回答，应当在同中国文化传统、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的联系中，评价那些在西方社会学概念体系中不曾出现的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学思想。

正是因为把中国社会学的开端与发展仅仅同西方社会学的引入联系在一起，一些著述才单纯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来考察和编辑中国社会学史，与西方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缺乏直接联系的、由中国学术传统传承而来的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则被排斥在中国社会学史之外，以致人们看到的中国社会学史就是一部对西方社会学引入和传播的学术运输史。时下在中国社会学界经常遇到的一个现象是：但凡要提到一个新的或比较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就一定要追寻它的西学来源，并且要注明它的西语词汇，否则其学术合法性就会遭到怀疑，似乎中国学者离开了西方语言就不会说话甚至不应该说话了。

历史既是过去经历的选择性记忆，也是未来图景的限制性展开。一个学科就像一个民族一样，它怎样选择、记载和编写自己的历史，不仅仅是对自己经历过大量事件的认同与否定，而且还意味着它将用肯定下来的某些人物、事件、范例去设计和展开自己的未来。因为，从来没有像兰克所说的那种纯客观的历史，人们所能见

到的历史文本和历史传说，确如柯林伍德所言，不过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中包含了理解者的价值原则。^①因此，历史不是单纯的陈述，而是对过去、现实甚至是对未来的评价。

由于用一种被简单化了的实证主义原则去选择、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学史，因此很多本来是中国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做出十分丰富的认识、解释和批判的社会学思想却被限制在中国社会学史之外。例如，康有为“去界求同”的制度社会学思想，梁启超的“史迹集团论”和“化育新民论”等等，都是直接对中国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深刻论述，可是这些植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思想或社会学理论，在关于中国社会学历史的研究文献中却看不到对它们的记述与评介。

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史的解释原则同它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原则是一致的，而其一致的根据在于中国社会学界的社会学观。黑格尔曾经指出，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能编写出什么样的哲学史。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正是以有限的西方社会学观念编写被简化了的中国社会学史，并且也同样以有限的西方社会学观念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如果不去回顾中国社会学家在历史中怎样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问题，仅仅观察中国社会学用有限实证概念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难以发现这种视野的局限；如果正视中国社会学实际的历史演化，将会清楚地发现这种视野的弊端。

由严复、康有为开端并经梁启超奠基的中国早期社会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中的显学，是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公共话语权、领导中国学术乃至整个时代精神的主导学科。早期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有如此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既有严复对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进化论思想引入的作用，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中国近代以来启蒙精神进一步发挥的作用。正是在西学思想与中学传统并举、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① 参见[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19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并重的多元统一中，早期中国社会学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各种层面，对当时中国社会改革与重建起到了推波助澜和引领航程的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实证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几乎同时在中国学术界生机勃勃地表现自己的风采，中国社会学以更加广阔的学术胸怀展开了自己。20世纪20年代，严思椿、易家钺、潘光旦、陈长蘅等人按照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开展了家庭人口问题研究，李景汉、陶孟和、陈翰笙等人开展了实地社会调查研究，这些都是较早的实证社会学研究。不过，这些实证研究亦有不同的特点。严思椿和易家钺的家庭问题研究，是一种类似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中国家族制度开展批判的研究；潘光旦则从生理学或优生学视角对人口生育问题开展了具有调查基础的实证研究；李景汉、陶孟和、陈翰笙等人不仅深入街头巷尾开展实地调查，而且通过问卷了解更具体的情况，并进行量化统计。

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这本著作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社会学的开端。^①孙本文于1927年至1929年间先后出版了《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文化基础》、《社会变迁》等一系列从社会学视角开展文化研究的著作。梁漱溟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本土特点，不仅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区别，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存在根据、展开形式和特殊功能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注重学理探究，运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与方法对中国文化现象做出理论概括，表现了浓厚的西学风格。

1920年前后，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

① 人们通常把梁漱溟称为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把他的社会学理论称为乡村建设理论，这种称谓没有恰当地概括梁漱溟的社会学思想。应当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是他的立足中国本土的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实践。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仅仅是其视野广阔的文化社会学的一部分内容。